

凭窗读史



罗常培



赵家璧



朱家溍



金受申



老舍

老舍的“朋友圈”

老舍先生平易近人，爱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，有政治精英、学界名流，也有贩夫走卒、寻常百姓，可以说五行八作，没有老舍不交的朋友。

在他的“朋友圈”中，既能看到周恩来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郑振铎、许地山、赵家璧，也能看到齐白石、梅兰芳、郝寿臣、焦菊隐，还能看到朱家溍、金受申、于是之……

从这个“朋友圈”中，能看到老舍先生多元的兴趣和广泛的人脉关系，也能体会到他的性情与志趣。本文介绍几位跟他互动频繁的人物。

一生挚友罗常培

罗常培，1899年8月9日出生于北京，字莘田，号恬庵，笔名尹耕，斋名未济斋，满族。他是语言学家、语言教育家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，生前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

长。罗常培是老舍的小学同学。老舍记得很清楚，自己从私塾转入学堂，编入初三二年级，与罗常培同班。他们的学校是西直门大街路南的两等小学堂。小学毕业后，虽然两人的

人生轨迹并不相同，但罗常培自192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，不管是做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，还是任京师第一中学国文教师、总务长、代理校

长，他一直跟老舍都有交集。老舍与罗常培既是发小，又是志同道合的挚友。老舍这样回忆他们的交往：在同学中，他给我的印象最深，他品学兼优。而且长长的发辫垂在肩前，别人的辫子都垂在背后。虽然也吵过嘴，可是我们的感情始

终很好。下午放学后，我们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《小五义》或《施公案》。出线总是他替我付。我家里穷，我的手里没有零钱。不久，这个小学堂改办女学。我就转入南草厂的第十四小学，莘田转到报子胡同第四小学。我们不大见面了。到入中学的时候，我们俩都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学，他比我小一岁，而级次高一班。他常常跃级，因为他既聪明，又肯用功。他的每门功课都很好，不像我那样对喜爱的就多用心，不喜爱的就不大注意。在“三中”没有好久，我即考入北京师范，为的是师范学校既免收学费，又供给制服与书籍。从此，我与莘田又不常见了。

师范毕业后，我即去办小学，莘田一方面在参议院作速记员，一方面在北大读书。这就更难相见了。我们虽不大见面，但未相忘。此后许多月中都是如此，忽聚忽散，而始终彼此关切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才又都回到北京，常常见面，高高兴兴地谈天道故。

记得在抗日战争中，我在北碚，莘田由昆明来访，我就去卖了一身旧衣裳，好请他吃一顿小饭馆。可是，他正闹胃病，吃不下去。于是，相视苦笑久之。

罗常培在治学与为人上，都很严格，学生们也都敬爱他。他不但要求自己把学生教明白，而且要求把他们教通了，能够去当独立一面，独立思考。罗常培做事认真负责，哪怕是一封普通的信，一张字条，也要写得字正文清，一丝不苟。

学者朋友朱家溍

朱家溍，字季黄，浙江萧山人，生于1914年。他从小在北京长大。其父朱翼庵，名文豹，1902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就读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，毕业回国后出任财政部盐务署署长。由于家学渊源，所以对中国的古籍碑帖有较多的了解，早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，朱翼庵即被聘为专门委员。书香门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图书外，也陆续收藏了很多各类文物。朱家溍从小就耳濡目染，在这方面非常了解。

朱家溍这样回忆自己与老舍先生见面的场景：

《茶馆》重演了，很自然地想起老舍先生。我在学生时代就非常爱读老舍先生的小说，并且在同学之间常常喜欢用“老张”“赵子曰”“马裤先生”等人的语汇来形容某些人和事。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联座谈会上认识了这位老前辈，于是成为朋友，每次见面总爱谈老北京的风土人情。

根据朱家溍的回忆文章，可以知道当时他们交往的诸多细节。有一次看完《茶馆》，朱家溍对老舍送上

祝福：“《茶馆》，真好”。

老舍不放过朱家溍：“好！难道就没有一点褒贬吗？你比我岁数小得多，可是老北京的陈谷子，烂芝麻知道的并不少，你瞧还得添点什么作料儿？”

朱家溍说：“作料儿，倒没什么可添的，剧本最好能作一点小修改。就是那个太监，应该在情节里规定他是被放出的、不当差的太监，就符合历史背景了。因为清代制度对于太监不论上至总管，下至无品级太监，除被差遣到某些官员家赏赐物品一类的差事之外，一概不准出去。如果有太监到戏馆茶馆闲逛，步军统领衙门会立即锁拿交内务府刑司治罪的。所以正在当差的太监绝不可能上茶馆。但到一定的年限也有放出的制度，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，不愿意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则安置他们到田庄。在城里北长街的万寿寺（注——全名万寿兴隆寺，非海淀区万寿寺），鼓楼东的宏恩观都是给太监养老的庙宇，像这种住庙的太监是可以上茶馆的，只要把剧本里说这个太监昨天正在伺候太后的几句台词改为‘侍候过太后，如今享清福’就可以了。”

老舍听完频频点头：“有理，有理。这点改起来不费什么，还有哪？也说说我听。”

朱家溍进一步说：“这出戏里两个兵说山东话，说明这出戏的演法要借助方言来渲染角色形象，我觉得这个太监说京南话。因为清代的太监都是京南任丘、河间、肃宁、衡水等县的人，他们都不会说北京话，说北京话也带很重的乡音，所以像茶馆剧中的太监说那样干脆流利的北京话是没有的。”

关于剧本台词，朱家溍以一个老北京的身份，与老舍进行了具体的交流，比如，他认为“王掌柜”一词在戏里出现多次，按照老北京习惯，常四爷、松二爷等熟主顾，对王利发当面的称呼应叫“掌柜的”，以不带姓氏最为合适。

第二幕里，松二爷的台词是“王掌柜，你好？太太好？少爷好？生意好？”朱家溍认为可改为：“掌柜的，您好？内掌柜的好？少掌柜的好？买卖好？”因为在从前，老北京都是这么说的。

事业好伙伴赵家璧

老舍和赵家璧是好朋友，也是事业上的好伙伴。

1946年3月老舍赴美讲学前夕，路过上海，他专门把赵家璧找来，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，这次谈话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。

赵家璧在1985年写的回忆录《老舍和我》中，记述了1946年2月19日老舍在王景康家中对赵家璧说的一番话：

家璧，你目前的处境，我从各方面都了解到。你办出版社的态度一向是认真负责的。“良友”的名誉卓著从30年代起直到现在，文艺界朋友都知道你曾出了不少力，做出过贡献。但是事业主要靠人去办，牌子仅起小小的作用。现在“良友”既然有人作梗办不下去了，我们两个人来合办一个新的……我到了美国，可能会拿到一点钱，如果有多，我就给你汇些美金来。你自己也去想法凑一点钱，这个出版社，除了出《老舍全集》外，其他仍然按你过去经营“良友”的办法多出好书，要为作家好好服务。

1946年10月后，老舍陆续从美国汇来了他所得到的部分版权，总计约2000美元。赵家璧为了取信于他，用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去登记公司，取名“晨光出版公司”。

老舍和赵家璧商量好，晨光出版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出《老舍全集》。其次，同时出版其他当代作家的原创作品。再次，出版翻译作品系列，定出选题请大翻译家来翻译，向读者介

绍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。

赵家璧是出版界的老手，这些任务后来都一一实现了，包括老舍自己的《四世同堂》（分三部出版：《惶惑》《偷生》《饥荒》）、巴金的《第四病室》《憩园》、钱锺书的《围城》等等，后来“晨光文学丛书”三十九种，以及“晨光外国文学丛书”“美国文学丛书”系列和一大批美术书刊，包括《新中国木刻选》等在内部问世了，这些书的装帧都很漂亮，有自己的风格，颇受读者喜爱和欢迎。“晨光”最终在当时的出版圈里成长为一棵大树，影响相当深远。

学生兼同事金受申

金受申1906年出生，比老舍小7岁，是著名的曲艺史家、民间文艺家、民俗学家，是老北京事故的“活字典”。金受申是北京人，满族，生于满族镶黄旗家庭，6岁丧父，10岁丧母，家道衰落，由叔父抚养。17岁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即为报刊撰稿，以稿酬弥补生活和购书之需。

金受申上的小学叫“京师第十七国民及高等小学校”，当时的校长就是舒庆春，所以金受申一辈子都称老舍为“舒先生”，即后来他们成了同事，依然这么叫。后来还管胡絮青先生叫“舒师傅”。

小学之后，金受申升入北京市第一中学，校长是罗常培（莘田），罗先生约老舍先生去一中教国文，于是老舍又成了金受申中学时代的老师。

1953年，老舍费了很大的周折，把他调进了北京市文联，并说：这可是个顶有用的人！金受申在北京市文联工作，直至1968年病逝。

金受申是北京民俗专家，北京轱角巷的邻居，没有他不了解的。后来金受申在工作之余，写了一本《北京话语汇》，把《红楼梦》《骆驼祥子》里的北京话当作词例都编入到里面去了，让人一看就明白。1964年再版时，还请老舍作序，成了一部畅销书。

就在出版《北京话语汇》之际，老舍开始写《正红旗》。因为《正红旗》写的是满族人的事，他需要金受申在民俗学方面为他把关。

老舍先生写东西喜欢朗诵。每写几段，必约几个好友相聚，香片茶伺候。然后，进房去取稿子，坐下来开始朗诵。写话剧的时候，老舍先生的朗诵对象是“人艺”“青艺”“儿艺”三大话剧院的导演和演员们。写《正红旗》时，朗诵对象是他的作家朋友们，听得最多的，便是金受申。他把金受申当成自己的民俗顾问。常常是只朗诵给他一个人听。念完了，两个人久久地讨论，聊起来没完。

发小卢嵩庵

卢嵩庵原名荣林，字松安。他是老舍在北京师范读书时的同学，毕业后，卢嵩庵在北师附小任教。他还与任小学校长的老舍一起帮助刘寿绵行善放账，办贫儿学校等，投身慈善事业。

抗战中，卢嵩庵因留北平。在此期间，他对老舍的母亲予以照顾，在老人家过世后又帮助安葬。1943年支持女儿甘英（前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夫人）参加革命，积极配合地下党组织的活动，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。1950年春，正是他介绍老舍购买丰富胡同19号住宅（即今天的“老舍纪念馆”）。1955年，他带领工人完成辽金1万多方石经的拓本，著有《房山石经整理记录》（手稿）。1958年在修建北京西山灵光寺佛牙塔时留下《督建佛牙塔日志》（手稿）。卢嵩庵藏书万卷，尤以易学藏书闻名。

李助南

沈从文笔下的北京古建

作家沈从文的后半生，以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为主业，用他形象的语言来说，是“花花绿绿，坛坛罐罐”的学问。这项研究，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化，有了广泛涉猎和深切认知，加上他文学家的丰富联想、精妙文笔，又使他的研究成果溢出许多异样的蓬勃。譬如对北京的古建筑，他的文字中就开拓出了多方面的思维空间，值得后来者顺着他的笔触游走与领略一番。

1956年10月，沈从文在《文汇报》上，发表了一篇散文：《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》。文章简短的开头，就将北京古建筑的情形，给予了高度概括和形象展示：“北京在世界上以古建筑著名。紫禁城里的宫殿，分布城郊的庙坛园林，每个单位都包括有一系列的建筑物，各有艺术上的不同风格，综合看来，又如同整体的一部分，是用故宫皇城大建筑群作中心，在五百年前北京建都总计划中就定下来，经过累代创修陆续完成的。设计规模的雄伟、协调、明朗，以及每一建筑物装饰的华美精细，都给人留下不易忘记的深刻印象。”

“围绕宫城的几个主要建筑群，例如南城的天安门和先农坛，西城的白塔寺和城外白云观与五塔寺，北城的钟鼓楼和鼓楼，东北城角的国子监、孔庙和雍和宫，城外的东岳庙，以及临近宫城的中南海、北海、团城、太庙和社稷坛、景山和高殿，郊外西山一带的碧云寺、八大处、卧佛寺、玉泉山、大觉寺……都是近五百年古建筑艺术的结晶。”这节如数家珍的排列，一方面可见沈从文对历史及北京古建筑的熟悉，从亲切的行笔，更可以见出他对这些古建筑的由衷热爱。

说到建筑情形，沈从文由于长期研究，尤其说得具体明白：“元代在这里作‘大都’，百年统治中，城郊庙坛园林不断有补充。白云观、护国寺、东岳庙、白塔寺，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。当时尼泊尔的大艺术家阿尼哥，和中国大艺术家刘元师二人曾经参加过这些庙宇园林的建筑设计 and 雕塑工程。”此外，“长城口居庸关的过街楼，也是这个时期作成的。”

虽然是这个时期建造的，可在沈从文看来，金代城池的建造，多取法北宋汴梁，间接还保留了洛阳和长安汉唐帝都的规模。他也从历史文献采集资料来说明：“《金史·张汝霖传》中曾提起过，当时装饰一个宫殿，就使用过汉族和回鹘锦绮丝绣工人一千二，经时两年才告完成。”今天人们阅读一些建筑的金碧辉煌，可想象出它们其中包含有多少人的金钱心血。还有其他例证：“今北海琼岛的建筑，虽从辽代始创，至于琼岛上的太湖石假山，却是金人攻下开封后，把‘寿山艮岳’搬来，搬石头来京堆砌成功的。”这样在北宋首都的“搬岳”“搬岳”行为，只能发生在大规模的战乱朝代更迭之时。

据说，元代在这座小山上建“广寒宫”避暑，房屋花木布置得和想象中的月宫仙境一样，当时还用人工激水上升到山顶，水从一个龙头口里喷出，变成小瀑布缓缓流入浴池中。这个宫殿建成后，连帝王都觉着过分，“明太祖因为这座宫殿过于奢侈，派萧洵来督工，把它搬毁。”萧洵当时是工部郎中，是个有心人，“搬毁”时，他才把原来琼岛建筑情况，一一记载下来让人知道。

这些宫殿虽然“搬毁”，可建筑材料依然可利用。“琼岛上石头剔透奇部分，明代搬移中南海，就成了现在的‘瀛台’。”说到这里，沈从文还借助资料，发挥想象，用文字复原了当时这一带的情形：“元代虽已利用海运转输南方粮食，南北运河还畅通，运河粮船能直达北海后海一带，当时在琼岛上远望，还可约见到千百艘大粮船，触舳衔接，桅樯如林的动人情景。”

若要举世闻名的北京建筑，莫过于天安门了。沈从文也专门作有《天安门》一文：“近几年来，我因工作关系，无论风晴雨雪，每天早晨晚间都得出天安门几次。”这般接触熟悉，写记起来，当然体会深切：“在一座高达三丈的棕红色台基上，高高矗起那么一座九楹重檐金碧辉煌的大门楼，两翼红墙向东向西延展开去，给人印象是雄伟、华贵而又十分沉静稳定。”

熟知这个建筑群的沈从文，将天安门融入其中加以介绍：“其实如就故宫建筑全部说来，天安门也只是宫殿建筑体系前一部分。再前还有正阳门，后边又还有端门。由端门进去是午门，这才是紫禁城真正的大门。”相较而言，天安门建筑以华美壮丽见称，午门却给了他一种端重严肃的感觉。

在历史上，午门具有“凯旋门”意味。明清两代国有大事，出兵远征时，将帅受命成行，多在午门前举行出兵仪式。战争结束胜利归来时，帝王就坐在午门上阅兵，慰劳将士，检视俘虏和胜利品。

午门下东西两廊，“共有八十四间厢房连接端门，过去是百官候朝的地方。天明前即冠带袍服云集，到候时候午门两侧角楼钟鼓齐鸣，才大小鱼贯进入午门、太和门，于太和殿前白石丹陛上等待召见。”

午门兴建于十五世纪，重修装金布彩于十七世纪末，如果站到午门楼上高处四望，故宫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建筑物，及内外东西六宫建筑群、文华武英二殿建筑群，都如近在眼前。在沈从文的笔下，那是“一重重明黄色琉璃瓦大屋顶，和秀挺不群矗立在城垣东西两座转角楼，共同在明朗秋阳下灼灼闪光，后背衬托着的是一大片蓝天”。“围绕着宫城百万户人家，半笼在郁郁青青的一片树木绿海中，这一切，真是够庄严、深厚、沉静和一种不易形容的美丽！”经过沈从文的实景描摹，这处经典建筑与自然、社会、人生，的确真正交融成一片“不易形容的美丽”。

还有一处建筑胜迹，沈从文当然也不会漏掉。1956年，沈从文还写记有一篇《春游颐和园》。

颐和园，沈从文实实在在于此居住过，所以他的这篇文章，似乎有更多的个人沉浸的感受。

为了让人们认识深入，他将这里的建筑分了“五个大的单位”加以介绍。第一是进门以后的建筑群。此建筑群是“除中郎大殿外，计包括北边的大戏楼和西边的乐寿堂，以及西边前面一点的玉澜堂”。对建筑，沈从文总力图以事件增加读者印象。譬如“玉澜堂相传是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囚禁的地方，院子和其他建筑隔绝自成一个小单位”。“这个戏台和中国近代戏曲发展史有些联系，中国京剧最出色的演员谭鑫培、杨小楼，都到这台上演过戏。”“戏台上上下下三层，还有个宽阔整洁的后台和地下室，准备了各种机关布景。”作为文学大家，他也特别善于以细节强化自己的说明：“例如表演《孙悟空大闹天宫》或《水漫金山寺》时，台上演到必要时还会喷水冒烟。演员也可以借助于技术设备，一齐腾空上升，或潜入地下，隐现不易捉摸。”这些技术今天看来虽有限，可显示了演艺家在当时对艺术效果的努力探求。今天人们感觉有趣的，沈从文也给予解说：“戏台面积比看戏的殿堂大许多，原因是这些戏主要是演给专制帝王和少数皇亲贵族官僚看的。”“乐寿堂庭院宽敞，建筑虽不特别高大，却显得气魄大方。本院和西边一小院，春天时玉兰和海棠都开得格外茂盛。”

全部长廊及排云殿、佛香阁，是“全园的精华”的第二部分。其中许多小的建筑单位，各具巧思。在沈从文看来，“得租一只小游船，把船直向湖中心划去，再回过头来，看看这个建筑群，才会明白全部设计的用心处。”这是一个艺术家对距离在建筑中作用的特别理解。

第三部分即“湖中心那个孤岛上的建筑群，龙王庙是主体”沈从文将建筑放进自然之中：“连接龙王庙和东堤柳荫路全靠那条十七孔白虹桥，长年卧在万顷碧波中，背景是一片北京特有的蓝得透亮的天空，真不愧叫作人造的虹。”“这条白石桥无论是远看、近看，或把船摇到下边仰起头来看，或站在桥上向左右四方看，都令人觉得满意。”

第四部分则一笔带过：“后山一带，建筑废墟并不少。”“目下重要的是有好几条曲折小山路，清静幽僻，最宜散步。”

第五部分是“以谐趣园做中心的建筑群，靠西上山有景福阁，靠北紧靠是霁雨轩。”“谐趣园主要部分是一个不规则荷花池子，绕着池子有一组长廊和建筑。”沈从文曾经体验过，所以感触满满：那个荷花池子，夏天荷花盛开时，真是又香又好。四周的树林里，清晨黄昏常有极好听的金丝鸟鸣。啄木鸟声也数这个地区最多。“夏六月天雨后放晴时，树林间的鸟雀欢呼鸣，更现出一片活泼生机。”他不但为游人提供了游览路线，更写出了颐和园里最迷人的气息。

可以看出，对北京的古代建筑，沈从文会从建筑与周围的时空加以联系，把作品与欣赏都融会贯通，形成完整的建筑价值意义。这是文章特色，也应是希望了解这些著名建筑的读者最为需要的。

杨建民



李可染笔下的颐和园风光